

邱五芳

论图书馆的公众性

摘要 公众性是图书馆的立馆之本。强化公众性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趋势。馆藏内容的公开性、载体的易得性及其独特价值是图书馆公众性的三大基石。当今,图书馆将越来越凸现其公众性特征。参考文献 34。

关键词 图书馆 公众性 馆藏公开性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hinks that publicness is a basis of library, and it is a trend of library development to become more public. Besides, the openness of library collections, availability of media and special values are the three major factors of the publicness of library. The publicness of libra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34 refs.

KEY WORDS Library. Publicness. Openness of library collections.

CLASS NUMBER G250

图书馆应该为广大公众服务,对图书馆人来说是一个基础常识。或许正因为太为普通平常,鲜见有专门的理论分析,在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双重冲击下的今天,似乎更有被淡忘的倾向。其实,这一理念直接回答了图书馆为什么要生存发展,涉及图书学基础理论的许多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为此,笔者特加诠释,以期对新世纪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1 公众性是图书馆的立馆之本

早在17世纪,现代图书馆先驱加布里埃·诺迪,在其著名的《关于创建图书馆的建议》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创办图书馆的目的”就是为公众服务,“如果不打算将书提供给公众使用,那么一切执行本建议前述方法的努力,一切巨大的购书开支,全属徒劳”^[1]。20世纪后这一理念已被普遍接受。革命导师列宁针对20世纪初俄国图书馆的情况指出,“要使这些巨大的图书馆不仅对学者和教授开放,而且也对一般群众和市民开放”,提出衡量图书馆好坏的标准不是看图书馆拥有多少珍本手稿,“而在于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间广泛地流传”^[2]。阮冈纳赞对这一理念也大加赞扬。他的“以格言出现的图书馆法则”第二条“书是供所有人使用的(book are for all)”,就强调了图书馆的公众性。阮冈纳赞认为这条法则在五条法则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将第一法则的“革命”进一步向前推进,而“第三法则也是作为第二法则的补充”^[3]。并明确提出了“图书馆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我们的图书,人人可借,人人可看”的口号^[4]。谢拉作为一位图书馆学理论大家,则从理性的高度,透彻地阐述了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器”的特性^[5],认为图书馆保存着人类经历的记载,“对所有需要和能够使用这些记载的人都应自

由开放。”^[6]

图书馆的公众性之所以备受重视,是因为它是图书馆职能充分发挥和实现的基础。图书馆是通过服务来发挥和实现其主要职能的,因此,接受图书馆服务的人员数量和广泛程度是图书馆职能发挥好坏的必要条件。这两者是成正比的,读者的量越多,面越广,图书馆作用发挥的条件就越充分,各项职能也就可以发挥得好。“正是通过个人,图书馆才能达到它的社会目的”^[7]。所以,图书馆要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读者面,离开了为最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图书馆的职能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我们在研究当今图书馆的职能作用时,多理论推导,而很少将我国图书馆职能与我国现实的公众需求结合起来,从而使得这类研究很难为实际工作接受。

事实上,对图书馆公众性人们在理论上虽无异议,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认为只是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与学术性、研究性、专业性较强的高校、科研及大型公共图书馆关系不大。这种依据服务对象的文化水平、社会地位和服务内容的深浅程度来划分图书馆公众性的结果,是将其局限于针对低文化水准人员的普及性服务范围,是简单片面的认识。图书馆公众性绝非抽象的理念,也不只是某类图书馆的职责,而是建立在图书馆独特的服务和功能定位之上的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共性。

任何通过服务发挥作用的机构对自己的服务对象都有大致的界定,图书馆的服务定位是其母体的全体成员。这种服务定位是其他与图书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机构所不具有的。现实中与图书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社会职能机构不少,如档案馆、博物馆就被国内外普遍认为与图书馆“共同发挥着作用”,“具有相同的文化性质,同属科学文化机

关^[8]。但由于收藏物的天然缺陷、功能的局限等因素,使之只能为社会某一阶层或某一部分成员服务,服务定位是其母体的部分成员,很难像图书馆那样能够接纳其母体的全体成员。

图书馆的服务定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从宏观看,作为社会机构,图书馆服务对象是社会的全体成员;就微观看,每个具体图书馆的服务定位是其隶属机构或区域的全体成员。这二者一是现实基础,一是理论提高。正是由于各级各类、各行各业图书馆都坚持为其母体的所有成员服务,才汇合出图书馆宏观层面的为社会全体公众服务。因此,讲图书馆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决非只是理论的赞美,而是所有个体图书馆坚持为隶属区域或机构全体成员服务的结果。实际上,图书馆类型多样化,正是图书馆在社会需求日益细化的环境中坚持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的结果。所以图书馆公众性的目标虽然是单一的,但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导致了各级各类图书馆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多样性。剥离了实施过程的各馆多样性,图书馆的公众性也就成了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空洞口号。

独特的功能定位是构成图书馆公众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图书馆有很多职能,但就每项具体职能而言,往往都有专职的社会机构承担,就任一具体职能而言,图书馆与专职机构相比一般都不占优势。图书馆的优势在于综合性。它能提供从休闲娱乐到高新技术各种信息知识,能满足从间接交流和直接交流的多方面需求,“这不仅因为图书馆书架上保存着人类经历的记载,而且还因为这些保存物体现着和能够满足所有人类生活的需要^[9]”。这种综合性的功能是单一功能突出的其它同类机构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图书馆傲立于各种专职机构之林的原因所在。综合性的功能定位确保了图书馆能够满足来自不同类型读者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没有综合性的功能定位,也就不可能有上述的服务定位。这两者一起构成了图书馆的公众性。

公众性使图书馆在同类社会机构中具有极强的相容性,在一些理论著作中被称之为“依辅性^[10]”。现实中的图书馆几乎可以与所有社会机构融为一体,设置图书馆的机构各行各业比比皆是,但很少见设置与图书馆性质相同或相近部门的机构。因为只有图书馆能为其母体的全体成员服务并满足他们的多方需求,从而融为该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公众性赋予了图书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最旺盛的生命力,使之在同类社会机构中数量最庞大、活动最频繁,也最受欢迎。所以,公众性具体说就是坚持隶属母体全体成员服务的服务定位和综合性的功能定位是图书馆的立馆之本,任何削弱这一根本的做法都将危及图书馆的生存。这是网络时代每个图书馆人必须具有的清醒认识。

2 强化公众性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趋势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某种程度说,图书馆发展历史就是逐渐强化公众性,并不断弱化和剥离与此相悖的职能的

过程。图书馆的每次重大变革都进一步强化和丰富着图书馆的公众性。

初始阶段的图书馆实际上是一个多种机构共生的综合体,集图书、档案、博物,乃至教育、研究等诸任于一身,笔者称之为原始状态的图书馆。我国“最早的官办藏书机构多兼有档案馆与图书馆的作用^[11]”。在西方,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档案学称为档案图书馆^[12],又是古代形态博物馆诞生标志^[13]的亚历山大博物院的主要组成部分。该院“是世界当时最大的科学和艺术中心^[14]”。正是由于这种综合性,西方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亚历山大城之‘博物馆’实际上是一所研究机构、图书馆及学院的联合体,与现代概念不同。^[15]”

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它是人类早期科学文化水平低下下的表现,在客观知识数量和种类都稀少的年代,社会没有设立各类专职管理机构的客观需求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只有当社会客观知识增加到一定程度,且载体制造技术也进步到能够对部分知识比较简单地加以复制时,专门对这部分知识进行整序和传播的机构才会应运而生。

在我国,这样的专门机构出现在西汉后期。汉初,图书档案收藏仍为一体,《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宰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显见,秦末汉初的官府藏书既有图书又有属于档案的律令。西汉200多年,全国性图书征集连续不断。“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经惠帝刘盈废私人藏书之令,武帝刘彻“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成帝刘骜“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故西汉后期,国家收藏的文献中图书的数量相当丰富,文献整序问题也因此日显突出。刘向等校书就是对西汉历朝所藏图书的全面整序。刘向校书图书馆人都很熟悉,但对最后一环往往视而不见,其实就图书馆学而言,如何保管校好的书,意义远较校书本身更大。《七录·序》言:“会向亡,哀帝使欲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温室之中书何以须徙于天禄阁上?盖温室为校讎之地,取便学者坐论,不便度藏书籍。故校讎既毕,乃度藏之于天禄阁也。”^[16]校好的图书单独分类贮存,结束了我国图书档案混合收藏的局面,昭示原始状态图书馆的分化,专门收藏图书的古代图书馆诞生。

原始状态的图书馆分化,意味着图书馆迈出公众性的第一步。刘向等校书是在全国公开征集的基础上进行的,内容显无机密性。天禄阁收藏新近校写的书,着眼的当然是它的内容,而非载体。将内容可公开、载体又不珍贵的图书与载体珍贵的文物和内容机密的档案分开,单独分类贮藏,无疑是为了方便经常、反复地利用。从《别录》、《七略》对单本图书内容的评判,以及“皆可观”、“亦有可观者”、“可常置旁御览”等具体的阅读建议也可知,刘向等的文献整序(校书)与利用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尽管能使用天禄阁图书的人极其有限,但比之收藏内容机密的档案和载体珍贵的文物之类的机构,它显然更具公众性。

如果说,古代图书馆具有公众性主要得益于收藏物的

话,即由于图书内容适宜公开和载体较为易得的缘故,那么现代图书馆越来越强化公众性的动力则主要来自社会,考察图书馆与情报机构的分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点。

“情报工作的母体是图书馆和学会”^[17]。其独立的原因很复杂,但与情报工作仅仅只能满足社会某一阶层(尽管是精英阶层)追求特定(最新)知识信息需求无疑有直接的关联。“一般认为,情报文献杂志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情报工作的形成”^[18]。编制文摘本是图书馆的分内工作,早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时期就已有之^[19]。但到19世纪末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科技文献的数量日益增多,科技工作者对情报的需求日益急迫,于是为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报道、检索科技文献的文摘索引类刊物陆续出现,现代情报工作终于诞生。几乎与这种需求增长同步,社会还产生了另一种迫切需求: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工人,要求已具备阅读能力的社会普通公众进一步提高文化素质。面对分化的社会需求,图书馆选择的是后者,公共图书馆的诞生和普及便是图书馆这种选择的具体表现。如果把情报工作的独立视为继原始状态分解后图书馆的第二次分化,那么这次分化是图书馆进一步强化公众性的体现。在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时,图书馆没有追求满足部分人的高层次需求,而是坚持为广大公众服务,图书馆发展也因之进入了现代阶段。

“一直到18世纪末叶,尚无真正的公共图书馆”,“真正公共图书馆的观念,是在19世纪早期,随着公共教育思想的兴起而来”^[20]。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特征是由公共财力支持,免费为当地全体公众服务。这种不依附于某种机构或个人,直接扎根于社会的特征,保证了公共图书馆的相对独立性,使之能够为一个地区最广泛的人群服务。公共图书馆的问世并很快占据了图书馆系统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说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但同时也反映了图书馆发展不断强化公众性的趋势。公共图书馆发展非常迅猛,很快成为最重要的图书馆类型。今日,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图书馆系统也日益复杂,类型越来越多,但公共图书馆始终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体现了图书馆强化公众性的趋势。

3 支撑图书馆公众性的三大基石

图书馆的公众性建立在自身的收藏和追求之上。收藏物的内容公开性与载体易得性和独特的价值追求是图书馆公众性的三大基石。

收藏物是图书馆活动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好象越来越让人迷糊,从图书、文献,进而知识、信息,现在又有 $\times \times$ 集合, $\times \times$ 库等等,总的趋势是外延越来越宽泛,因此内涵也越来越抽象。笔者采用图书馆收藏物是文献这个目前最普通的说法,并采纳最权威的解释: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21]。按此观点,图书馆的收藏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内容层面和载体层面。

在这两个层面中,图书馆人在理论上注重的是前者。文献的内容由知识组成,知识是图书馆学当今最火爆的研究热点,这也足以充分佐证图书馆对文献内容的注重。目前普遍认为,图书馆收藏的是客观知识。客观知识是与主观知识对应的概念,来源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波普尔的世界3指一切客观的精神世界,即一切见诸于客观物质包括言语、图文,乃至实物的精神内容,范围极其广泛^[22]。图书馆的收藏显然无法如此广泛,一般限定于客观知识中用图文记录的部分。但考察现实的图书馆可以发现,这样的限定仍然过于宽泛。现实图书馆的收藏主体是已在社会上公开的文献,即知识生产者本人愿意且已公布于世的部分。也就是说,在图文记录的知识中,图书馆只收藏已在社会上公开的部分,笔者称之为社会公开知识。我相信对图书馆现实有所了解者都难以否认这点。

在客观知识中,社会公开知识问世须经过了层层“把关人”的审核,因此具有权威性高、可靠性强的特点。我们常自诩图书馆在社会上享有良好声誉,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图书馆收藏提供的知识信息已经过了社会专门机构的层层审核。收藏物的内容公开性和可靠性,是图书馆公众性的知识基础。无视客观知识与社会公开知识的区别,笼统地讲图书馆收藏的是客观知识不符合实际,无论对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工作都是极其有害的。

文献是内容与载体的统一。对待收藏物的载体,图书馆与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截然不同。这些机构以实物为活动的基础,收藏极其注重载体,收藏强调物原制品,一般不收复制品。载体真实是它们收藏的第一标准。在现代,载体真实甚至还特指三维实体,即这些机构的收藏物不能只是纯粹的信息或抽象的概念,而应是实物。与这些机构不同,图书馆的活动是建立在知识信息基础之上的。尽管当今图书馆对珍贵原件如古籍善本的收藏极为重视,但就整体而言,图书馆收藏注重的是文献内含的信息知识,而不是文献的载体,即注重内容的真实可靠,而不在于载体的形式。事实上,为保证文献能被大量经常的利用,图书馆不但不要载体的珍贵,反而强调其普通易用。载体普通易用是社会公开知识被广泛传播和利用的物质基础,现代概念的图书馆也只有造纸技术和现代印刷技术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正因为此,图书馆活动既极易受载体制造技术的影响,但又无惧日趋复杂的载体冲击。

由于图书馆收藏的文献既无内容的私密性,又无载体的珍贵性,因此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完全可以不通过图书馆,自己获取和拥有文献。图书馆的作用好象很有限:只能帮助人们获取因种种原因他们自己不能或不便获取的图书。但从古到今,图书馆从来都没有满足于如此单一的职能,都或强或弱地履行着社会教化的职能。当然,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

古代图书馆一般由著名学者担任管理者,承担着类似

现代出版机构的职责。对于刘向校书,学术界有人认为是为宏扬古文经派,对此笔者不敢妄评。但观其校书过程,“首先是集中一书各种不同的本子,互相比较”。“一书经过校讎以后,最后写成本”^[23]。实不亚于重著,套用“知识重组”这个现在很流行的词语非常合适。刘向校好的“定本”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的正式出版物。西方古代图书馆也是如此。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山大图书馆也具有这一功能,“这个图书馆的建立者显然期望尽力收集全部希腊文献最好的版本,系统地加以排列,以便成为出版注疏的基础”^[24]。也就是说,古代图书馆不仅承担着对已有图书的整序职责,同时还兼有向社会推广图书馆建立者或管理者认为内容正确的和有价值的图书的责任,尽管接受这种推广的对象十分狭窄。

随着图书制造技术的进步,以后的藏书楼很少再像刘向那样编写“定本”,但校讎刊刻一直是我国藏书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藏书家有考订、校讎、收藏、赏鉴和掠贩五家之分,考订家最受推崇,因为他们“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25]。又如古代藏书家都十分重视对藏书“的系统分类,因为图书‘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26],分类能为读书指引门径。从‘刘向司籍,九流以别’^[27],经郑樵的‘类例既分,学术自明’^[28],到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概括,追求担当指引图书利用的师长是古代藏书家的主流和最高境界。

现代图书馆虽然基本剥离了出版发行的职能,但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现代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远比古代图书馆深广,对象更为广泛,内涵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特别是图书馆人对图书馆教育职能的认识也更为清晰。美国1938年通过的《图书馆员道德准则》总则第1条开门见山写到,“图书馆员应当认识到图书馆事业是一种教育事业”。阮冈纳赞也明确指出:“每个读者有其书”这一规律的前提是“教育为人人”^[29]。这些“准则”、“定律”清楚地表明了现代图书馆对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视和强调。事实上公共图书馆就是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而发展起来的。进入信息时代,社会公开知识的增长数量远远超越了人的接受能力,加上社会公众文化程度的整体提高,当代图书馆更强调“知识导航”功能。但这仅是图书馆社会教育重点的转移。从表面上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强调社会教育职能及“知识导航”风马牛不相及,但追求一脉相承,都是以指导阅读的社会师长自居。当前的图书馆学似乎更愿意标榜图书馆对知识获取的“公平”“自由”,但自古到今,图书馆都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社会教化的职责。

这样的追求自然要求图书馆始终面向公众,而内容可公开、数量又较多(即无载体珍贵性)的收藏又为图书馆准备了贴近公众的物质条件,因此在具有相同文化基因的社会机构中,图书馆最易于公众接受、最便于公众利用、最适于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

4 新时代的图书馆将凸显公众性特征

图书馆正在迈入新的时代,信息技术无疑是最大的推动力。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客观知识的载体层面,即通过改变客观知识的传播和利用的手段与方式,进而影响图书馆活动的整个流程。但日趋复杂的载体和五花八门的传播手段并没有改变图书馆活动的本质,相反,信息技术带来的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和社会交流方式的转化,以及社会信息知识量的剧增,使新时代图书馆的公众性不仅不会削弱,反而将会大大加强。

信息技术为客观知识最大限度地利用提供了可能,使图书馆被更加广泛地利用提供了条件。首先,信息知识的传输更为便捷。网络特别是因特网的普及,使信息知识的利用不再受时空限制。而超文本链接方法突破了知识信息单线组织结构,使检索更为便利。就传输而言,图书馆(笔者这里指的是个体图书馆)在理论上确已迈入了新时代,具备了为全社会服务的能力。其次,信息知识的接受更加容易。复现是客观知识利用必不可少的环节,指知识的接受者对知识生产者所表述的内容的理解,在以文字为主要传播手段时期具体表现为阅读能力。公众缺乏知识复现能力曾长期阻碍着客观知识的利用,而公众具有这种能力则是图书馆普及的前提。多媒体传输技术改变了单一文字平面传播的局限,使知识更易被公众理解接受,这必将促进图书馆的发展。

信息技术在使知识信息利用越来越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其中两点对网络时代图书馆强化公众性影响甚大。首先,网络信息良莠混杂现状要求图书馆进一步强化社会教育职能。网络的开放性使社会知识信息传播的传统审核机构无能为力,自由开放的网络,就像一块可以随便涂鸦的黑板,信息发布缺少社会公认的权威把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现象日趋严重。传统的社会公开知识,内容真实可靠由专门的社会机构负责,图书馆主要是依据本馆性质任务有针对性地收藏提供。但如果图书馆大量传递的是网络信息,其工作重点就不可能再维持在这样的基点上。在正式和非正式交流趋于模糊的网络时代,随着一些社会审核机构的削弱,图书馆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强化自己的信息甄别功能,就像社会过滤器一样,滤去信息杂质,只向读者提供被社会主流认同的、比较真实可靠的知识信息。目前我国网络普及程度不高,图书馆更关注通过网络开展一些高层次服务。但是,随着网络的活话化,非学术性人群会迅速、大量地涌入,网络人口早晚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也必将结构性地改变图书馆网络服务的重点和方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这种结构性变化已近在眼前,去年我国网民已达2250万,比前年增加1.5倍^[30]。上海图书馆与上海有线电视台合作建设的“互动电视”“我的图书馆”“送入千家万户”项目^[31],通过大容量的有线电视网把数字化知识信息直接送到居民家中,向

读者(观众)提供真实可靠的知识信息的任务已经现实地摆在面前。

其次,网络创造的人类新的交流方式与传统交流方式的平衡问题要求图书馆进一步强化它的综合性功能。知识信息的传播利用,说到底是人类交流的一种方式。人类传统的交流方式主要是“人—人”的直接交流,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交流越来越借助快捷便利的网络,明显地呈现出“人—机(网)—人”的间接性特征。因特网形成的与现实世界不完全吻合的虚拟世界,造成了人的个体自我同一性的分解,进而产生一些精神疾病,如网络依赖症,美国心理学会早在1996年制定了诊断的10项标准^[32]。在我国,随着网络的普及,此类病症也屡见报端。维持两种交流的平衡,已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等社会各领域所普遍关注。网络时代人们对直接交流的渴望,将给图书馆带来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事实上,新近建成或在建的图书馆,在重视信息技术武装的同时,无不把为读者提供一个优雅环境作为建设重点。在考虑功能布局时,除了保留传统的借阅服务场所和强化的网络服务功能外,很多还新辟有颇具规模的会展区,很清楚地显示出拓展直接交流功能的意图。从理论上说,如果公众利用社会公开知识没有明显障碍,图书馆的生存势必会受影响,“图书馆的消亡论”便是这种理论的极度推理。但即便持这种极端观点的代表也清楚地看到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图书馆是不会消亡的^[33]。

当然,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也必须影响到图书馆公众性。如知识信息的传输便利使个体图书馆能够轻松地为其母体的成员服务,这种超越服务达到一定程度,势必会动摇图书馆传统的服务定位。但“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顺应环境变化而自我完善是“有机体”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图书馆界持续讨论收费问题,8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界出现的创收、收费问题,实质上便是图书馆服务突破传统服务定位后的一种自我调节。这种调节的本身就表明,图书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服务定位^[34]。

参考文献

- 1 加布里埃·诺迪.关于创建图书馆的建议.见:袁咏秋,李家乔主编.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32
- 2 丘巴梁著;徐克敏等译.普通图书馆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17,52
- 3 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法则.见:袁咏秋,李家乔主编.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67,278,275
- 4 阮冈纳赞著;夏云等译.图书馆学五定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113

- 5 谢拉著;郑肇生译.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服务的基本要素.(台)枫城出版社,1986:37
- 6 谢拉.图书馆学引论(前言).见:袁咏秋,李家乔主编.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11
- 7,9 谢拉.图书馆学基本原理.见:袁咏秋,李家乔主编.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08
- 8 王英玮主编.档案文化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66
- 10 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58
- 11 王绍平等.图书情报词典.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1007
- 12 韩伟之.外国档案管理简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27
- 13 严建强.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5
- 14 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5~56
- 15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65
- 16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48
- 17 黄立军.情报工作概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18
- 18 严怡民.情报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159
- 19 (美)哈罗德·博科,查尔斯·L·贝尼埃;赖茂生等译.文摘的概念与方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 20 谢拉著;郑肇生译.图书馆学概论.(台)枫城出版社,1986:26
- 21 见: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
- 22 袁澍涓.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77~183
- 23 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9~10
- 24 袁咏秋,李家乔主编.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3
- 25 (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
- 26,28 (宋)郑樵.通志·校雠略.
- 27 (汉)班固.汉书(叙传).
- 29 阮冈纳赞著;夏云等译.图书馆学五定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66
- 30 见:文汇报,2001-01-18
- 31 见:图书馆杂志,2001(1)
- 32 王树茂,陈红兵.现代科技与人的心理.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53~54
- 33 见: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109
- 34 范并思.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图书馆,2000(6):1~4

邱五芳 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上海图书馆《图书馆杂志》编辑部.邮编 200031。

(来稿时间:2001-06-13)